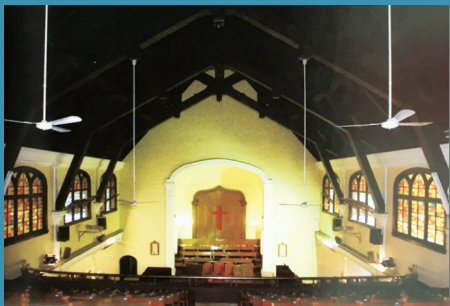


爱上
北外滩⑥

▲ 景灵堂内景



▲ 景灵堂顶部



▲ 1920年代的景林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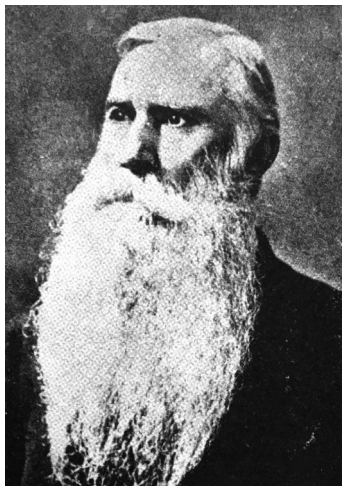
景林堂百年记
缘起

▲ 景灵堂外景

基督教景灵堂，原名景林堂，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区昆山路135号，原属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

1860年，美国监理公会派林乐知来沪传教。林乐知到上海后，在虹口一带购置大片土地，以昆山路为中心，北至海宁路，南至塘沽路，东西直抵吴淞路与乍浦路，面积40余亩，作为传教的根据地。1882年，他率先在昆山路创办中西书院，又开设印书馆，建造书院教师与传教士的住宅；同时兴建大批的公寓楼房，出租给居民居住。

监理公会除了在华传教以外，还向南翔、七宝、昆山、苏州等地拓展福音事工，并且建立了多个教区。至1886年，监理公会在华传教已初具规模，同年11月17日，在上海昆山路中西书院对面的林乐知住宅，宣布成立中华监理公会，并举行了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年议会。



▲ 林乐知(1836-1907)

中华监理公会在上海划分两大牧区，以昆山路为中心的区域是其中一大牧区。教堂就设在中西书院大楼的底层，也称作中西书院的传教站。教会早期的信徒主要是中西书院的师生及其家属与附近的居民。林乐知为首任主任牧师，以后是潘慎文和葛责恩。当时的主任牧师又是中西书院的院长。那时，教会与学校是合在一起的，兴办学校是传教的一个事工。

1901年，中华监理公会在苏州开办东吴大学。1911年，景林堂主任牧师葛责恩被派往苏州任东吴大学校长，中西书院随之改为东吴大学第二附属中学。1915年，第二附属中学利用教室在夜间开设法律学科，定名东吴法科。1919年，经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东吴法科改为东吴法学院。1935年，东吴法学院归入东吴大学，改称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法学院因其基督教办学的理念而一举成名，教学地位一再升格。自从创办学校以来，这里人才辈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法学界人才。从1930年代至1990年代，国际法学院共有数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直到1997年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学生。抗战胜利，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几乎全都来自东吴法学院。当时，在法学界有着“北有朝阳，南有东吴”之称。

1920年代初，教育政策要求宗教与教育分开，又因教友人数不断增长，在东吴师生及中西教友的捐助下，于1922年，中华监理公会在东吴法学院对面，兴建了一座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堂，冠名景林堂，以示景仰林乐知之意。新堂于1924年竣工落成，由新派来的主任牧师江长川主持献堂感恩礼拜。



▲ 1917年宋家合影

前排：三子宋子安
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
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景林堂建筑为巴西利卡式，平面方整，并具有哥特式特征。主室内圈由八根钢柱支撑，中央拱形屋顶与东西两侧屋顶的落差处，设有两边对称的成排窗户，增添了内部透光与通风的效果。大堂外墙正立面为三个对称排列的山墙构成，中间大山墙开设一扇高达两层的大幅拱窗，两旁山墙屋顶均由十字脊双坡构成。外墙为清水红砖砌筑，屋顶铺灰色平瓦。整座建筑共有三层，底层是副堂，主堂设在二楼，三楼为主堂的楼座；内部面积1067平方米，可容纳1500人同时礼拜。

自1906年始，教会主任牧师由华人担任，依次为唐沐三、袁恕庵、李仲覃、江长川、俞止斋、孙彦理、戴仰钦。江长川牧师和孙彦理牧师分别于1941年和1985年被祝圣为主教。

宋氏家族与景林堂有着渊源，宋耀如是监理公会早期的传教士，1886年1月，他从美国来到上海，先后被派往昆山及七宝宣教。1888年9月，在中华监理公会第三届年议会中，宋耀如被按立为牧师。1890年，他辞去监理会职务，但仍为本堂义务牧师，继续担任中西书院的教职。他的家人全是景林堂教友，宋老太太是虔诚的信徒，经常由其子宋子良陪同前来礼拜。宋子文也常在保镖的陪同下到景林堂礼拜，他的婚礼是江长川牧师主持的。宋美龄于1917年从美国



▲ 景灵堂旧貌

深闺、园中和园外的行走
——我眼中的昆剧表演艺术家沈映丽(上)

■胡晓军

沈映丽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上海昆剧团当家闺门旦，MFA艺术硕士，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理事。第1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师承王英姿，得张静娴、张洵澎、华文漪、张继青、梁谷音、沈世华、王奉梅、王芝泉等多位名家亲授，博采众长。代表作有经典剧目《牡丹亭》《长生殿》《紫钗记》等，原创剧目《红楼别梦》，实验剧场《椅子》《伤逝》《浣沙记》《一场穿越历史的演奏会》以及“音乐剧场之戏曲三重奏”《惊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三轮车上的小姐》、交响诗曲《情殇——霓裳霓裳杨贵妃》等。

致力于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为首位受邀赴BBC录制的中国昆曲艺术家，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文化部联合颁发的“促进昆剧艺术奖”；积极探索当代昆曲发展路径，以“作者戏剧”的文化理想融情入戏，不断开拓从舞台出发的东西多元文化视野；推动传统艺术融入生活，创办“映丽道场”，提出“昆曲是有美感的生活方式”的理念和方法。

二十六年元，元宵节的上午。海南市老城厢文庙的祭孔仪式刚刚结束，文艺表演随即开始，第一个节目便是昆剧。临时搭的露天舞台，四四方方，空空荡荡，舞台下的观众坐坐立立、熙熙攘攘。杜丽娘登场了，她容貌姣好，身材窈窕，粉黛薄施，裙裾轻摆，晴光似数也数不清的射灯，随她旋转，共她进退，在她的钗头和鬓尖闪烁，伴她在全上海最古老的建筑前寻梦。有一位青年碰巧在场，本来只想略略张看，不料看着看着，看得呆了，以至于不知风儿是自然如此，还是因她的举手投足而冷暖不定；以至于不知花儿是自然如此，还是因她的低吟浅唱而开谢不停。

那位青年，就是我。那是我平生所见的第一场昆剧、第一位昆剧演员。那位演员，就是沈映丽，已在上海戏曲学校坐科八年，即将出落成上海昆剧团的闺门旦。

虽然出身戏曲家庭，天资聪颖，技艺娴熟，

但那时的沈映丽无论技艺还是经验，都好比未出深闺的杜丽娘。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东西方古典戏剧的巅峰，他们代表作里的主人公，理应是同等量级的存在。别的不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杜丽娘也如此，当年她演的杜丽娘，在我的眼中也如此。

在沈映丽的眼中也如此。演了上百遍的杜丽娘之后，她从感觉，发现到终于认定，原来杜丽娘是会跟着每一个演她的演员，跟着每一个不同的生命体而变的。“我能演得像杜丽娘，但我永远不可能变成杜丽娘；我能学得像前辈们，但我肯定不可能照搬不走样。表演艺术应该从忠实的继承开始，再到个性的表达完成。所以，演员一定要找到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沈映丽的这个见解，不仅是主观的认识，还源于客观的事实——同为旦行前辈，华文漪演的是杜丽娘的典丽，张洵澎演的是杜丽娘的华美，梁谷音演的是杜丽娘的绮艳，张静娴演的是杜丽娘的素雅……“是不是不断地照搬和模仿，就是用功？”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原因是“继承是一种仿旧，毕竟不是真的旧”，演员必须通过娴熟的技艺，将自己的个性注入角色，才能真正赋予人物以活的灵魂，包括思想和情感。

对传统的认知，对经典的态度，主导了她对前辈技艺的非被动继承，也主导着她对当代昆剧的更主动创造。

二

回头来看，沈映丽所在的“昆三班”注定要在当代昆剧史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展示更独特的形象，这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传字辈”“昆大班”“昆二班”更多、更新的任务——对传统老戏的承继、对古典文本的再造，对当代原创的摹仿，对自身技艺的创建，对当代社会的融入……当然目的只有一个，即对昆剧艺术的弘弘繁荣和永续发展。

因而除了《牡丹亭》，还有《白蛇传》《玉簪记》《蝴蝶梦》《贩马记》《占花魁》《评雪辨踪》《墙头马上》《百花赠剑》……“闺门旦”的戏，她几乎都演过了；其他行当的戏，她很多也参与了。

因而还有《潘金莲》。上世纪80年代末的

文化思潮，使潘金莲成为戏剧重新诠释的文学人物。“上昆”经过对古本和现存折子戏的整理改编，由梁谷音演出了潘金莲的新意味和新韵味。十年后沈映丽接棒再演潘金莲，不惟推了她的行当，更是跨了她的形象和气质。然而演员就是演员，生活中与舞台上的距离越大，就越是一位好演员。通过求教、经过努力，她演出了一个与前辈“和而不同”的潘金莲的形象。这次对当代原创的再创造，不仅使她发现了“表演就像当侦探，去慢慢地发现人物的蛛丝马迹，揭示灵魂的灵光片羽”，而且让她证实了对演绎杜丽娘，以至于演绎所有古典戏剧人物的感觉是正确的：“从暗自摸索到真相大白的整个过程，演员的个性与风格要始终与人物的灵魂相伴随。”

因而还有《长生殿》。沈映丽被选定在第二本《霓裳羽衣》中出场。这是杨玉环与李隆基继“以钗盒定情”后，再“以歌舞固情”的重场戏，唱工吃重自不待言，做工更是重中之重——“霓裳羽衣舞”的成败直接指向能否展示人物的年轻、美貌和天赋才华，能否展现人物正沉浸于超越年龄、伦理、地位的爱情中时的忘我喜悦。为此，沈映丽遍访各大舞校，收集音像资料，着力摹仿，潜心创造，终将敦煌飞天、西域胡舞和戏曲技艺诸要素融为一体，在直径仅1.2米的琉璃翠盘上由缓趋疾、由疾转烈，于炽热到烈火烹油时戛然而止。这段舞蹈兼具了美妙的观赏性与强烈的象征性，令观众在赞叹之余，生之黍离之悲，从而出色地接续了头本与三本的情感逻辑，成功地诠释出全本《长生殿》的思想主题。

那些年的沈映丽，无论技艺还是资质，都好比走进园中的杜丽娘。然而她姹紫嫣红开遍，却是乏人欣赏。戏曲长期处于低谷，无人能测它的深度，昆剧最是如此——观众白发比黑发多，甚至有时台上演员比台下观众多。沈映丽和她的“昆三班”同学们似乎“演”不逢时。在那些年里，他们用青春来坚持，用心灵在等待。但这需要定力，需要既来自艺术又来自性格的定力。作为一个古老传统文化品类的守护者，必须既对艺术的敏感，又有对物质的钝感。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但沈映丽是如此。那时候如此，现在也如此。



1982年，我在虹口人口普查

■刘翔

2020年，我国将进行第七次人口普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睹街道人口普查员走家串户，宣传人口普查政策那忙碌的身影，我的思绪不禁回到1982年自己参加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日子。至今，我还珍藏着两张当年参加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证书和普查结束时全体普查员的合影照。该证书是由上海市第三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颁发的，一张是发给所有参加普查工作人员的，另一张则是专门发给普查指导员的，我因为同时担任了这两项工作，所以也就得到了两张证书。

那时我还是个刚从学校毕业、20岁出头的小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阶段时，市政府要求从各单位抽调干部参加普查工作。单位领导便对我说，你年纪轻，派你到外面去锻炼锻炼。这样，我就来到了虹口区曲阳路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担任了为时半年多的普查指导员。普查办公室成员都是从机关、派出所、学校、医院、企业等抽调组成，办公室负责人是从海军部队转业到街道担任副主任的老李，和曾经在黑龙江当过森林警察的白连波。

上世纪80年代初不像现在信息化程度这样高，电脑这玩意我只是听说过，却没有见过，互联网就更不要说了。因此，我们的普查工作完全是依靠手工操作，首先要从曲阳新村派出所里把一本本厚厚的户口内册搬出来，然后在民警的指导下，一家一户地仔细核对一遍后登记在人口普查

的草表上，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要求高，不容许一丝差错。80年代初的曲阳路街道还是个城郊结合部，有不少自然村和一些老旧的工房。同时作为上海东北部的一个正在逐渐兴起的大型居民住宅区，许多地方都是一个个建设工地。等到正式普查的那天，我胸佩人口普查指导员标志，带领一名普查员按照管辖的区域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核对。好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十分纯朴与好客，对政府的号召积极响应，很配合我们开展人口普查，只要敲开一户人家的房门，左邻右舍听到后，都会自动打开房门，将我们请进屋内，并且还递茶倒水，非常热情，没有一点戒备之心。因此，普查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最终，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市区两级政府的高度好评。

如今，每当我驱车途径早已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曲阳新村，总会油然而生一种别样的情感。现在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人口普查碰到了不少难题，一些居民以保护自己住房、人口隐私等借口，拒绝普查员的登记，甚至会拒普查员拒之门外，不予理睬。回过头来端详自己那两张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证书，回忆那一段参加人口普查的时光，不禁感慨万千。而多年以后，我执意要从政府机关“跳槽”到公安机关，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和1982年参加人口普查时，和派出所的民警朝夕相处后，衍生出对人民警察“一往情深”的后遗症吧！最终如愿使得自己成了一名人民警察队伍中的一员，这也算是第三次人口普查给我带来的意外收获吧！



与清晨开展一次交流
相信微雨过处
花朵会更艳
那是人与自然的
朱及开口的部分